

洛川会议：

吹响全面抗战的号角

■ 印 祺 蔡宏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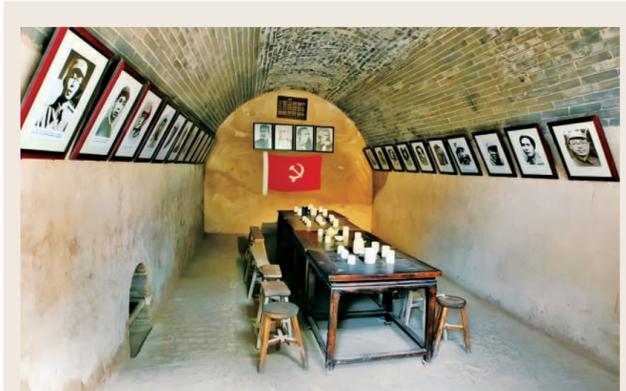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一个对于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在地处偏僻的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正是从这里发出全面抗战的动员令，使抗战的烽火燃遍全国。这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国抗战开始。8月，随着战事日趋紧张，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部队实行改编，准备开赴前线。在此形势下，为进一步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确定党在抗战时期的纲领、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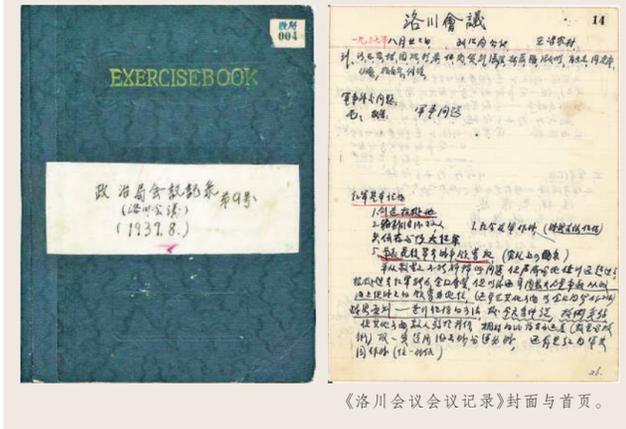
考虑到这次会议要扩大到部分红军将领，而大部分红军主要将领当时都驻扎三原、富平、泾阳一带。洛川地处延安和关中的中间地带，参会将领骑马一天便可赶到，因此这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选址洛川。随后，毛泽东交给军委参谋长萧劲光一个任务：“党中央的这个会议准备去洛川开，安排个开会的地方”，并特意叮嘱“不在洛川县城，那里不安全，要选个安全的地方”。

受领任务后，萧劲光和兵站部部长杨立三等人立即出发。当时正值雨季，一连几天都是倾盆大雨。萧劲光和杨立三等人乘坐大卡车，70公里路走了大半天，最终在洛川界子河附近的冯家村停了下来。

冯家村位于洛川塬上，四面都有沟壑，除一条大路外，还有四通八达的乡间小路。同时，村子距离界子河只有10公里，界子河北就是红区，便于红军随时撤离。村口有庙宇和戏楼，可以宿营。村旁有个大池塘，可以饮水。村里有五六十户人家，在当时算得上大村子，可容纳较多的人员驻扎。村子周围有围墙和城门，便于防守；村里户户相连，巷巷相通，便于疏散隐蔽。村子南边有个私塾小学，桌椅板凳齐全，便于开会使用。小学后靠村庄窑洞院落，前面是个打麦场，地势开阔，不利于敌人隐蔽接近，各方面条件都比较理想。以上这些可谓“地利”优势，最关键的还是“人和”，富县、



位于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冯家村的洛川会议旧址。



《洛川会议会议记录》封面与首页。

洛川一直是游击队活动的地方，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游击队可以配合红军及时控制局面。洛川的老百姓虽身处白区，但心向共产党，使得中央决定把会议地点确定在冯家村。

8月22日，洛川会议正式召开。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0多人出席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军事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

他明确指出：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我们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政策和国民党单纯政府抗战的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倒退的前途。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

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要求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站在抗战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

为在新形势下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等11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亦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亦称副主席）。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设立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同时建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长江沿岸委员会。

在会议召开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改编命令，宣布红军主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会议就国共关系、战略方针和出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着重讨论了军事战略问题。据聂荣臻回忆，“在这次会议上，讨论时间比较长，议论比较多的，是八路军出征以后的作战方针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曾经出现过不同的意见。”会议确定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起初，有一部分同志提出应当以运动战为主，认为八路军开赴前线后应该先集中兵力打几个大仗，以便于扩大我党的影响，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对此，毛泽东在会上从理论到实践等角度进行了耐心解答。但由于时间紧迫，会议对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主次关系问题未能充分讨论。

洛川会议虽然只有短短4天时间，却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为全国抗战制定了正确路线和战略总方针，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明确了我军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对进行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蒋介石集中兵力对付江西中央根据地，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则暂取守势。鄂豫皖红4军瞅准这个向外发展的良好时机，向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建议：留一部分兵力发动群众，肃清河南商城亲区等地的反动武装，集中主力向外发展，南下蕲（春）、黄（梅）（济）地区，从而恢复根据地，解决部分经费及粮食问题，同时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

同年6月底，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红4军南下行动的方针，但对于具体方向和兵力使用没有作出决定。7月上旬，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商城西南的余家寨召开会议研究解决这一问题。会议决定留第12师1个多团在皖西活动，留第13师全部和第10师第29团、第11师第32团开辟亲区和巩固鄂豫边地区，其余第10师、第11师各2个团和第12师的1个多团南下作战。

红4军接受任务后，立即进行南下作战的广泛动员，部队士气高涨。此时，徐向前调任红4军军长，原军长旷继勋调任第13师师长，刘士奇调任军政治部主任。

7月中旬，徐向前率红4军南下的部队，冒着酷暑炎热、克服重重困难，由河南商城亲区向东南进发。

8月1日拂晓前，红4军以第11师2个团，在第12师1个多团的配合下，进攻英山县城。当时，英山县城里有敌第57师第169旅1个团和团地方反动武装约300人驻守，他们凭城依险构有坚固工事。

战斗打响后，红4军兵分3路攻城，一部袭击城北要点鸡鸣尖下；一部攻占城西的西门关山与立龙咀；另一部攻占城南要点坡儿坳、白石坳等阵地，歼敌5个连。敌军仍据险顽抗，红军攻势受阻。

下午，红4军调整部署，计划以一部佯攻鸡鸣尖，主力从城西北角攻城。经过周密准备和充分动员，红军于16时再次发起攻击。第33团当即攻占城西北角船形山、凤形山等阵地，全歼守敌，一举占领北门、西门。第31团也乘势由西南角突入城内。经2小时激烈巷战，红4军全歼城内之敌。城北鸡鸣尖守敌见困守无望，遂缴械投降。此次战斗，全歼守敌，无一漏网，生俘敌团长张汉全以下1000多人，缴长短枪1000多支、重机枪18挺和迫击

炮4门，红4军南下作战首战告捷。

战后，红4军派第12师在英山地区留守开展工作，军部率第10师、第11师4个团继续向南进击。8月8日，红4军进占蕲水，接着攻克罗田。19日，红军又一举歼灭驻守在蕲春漕河镇的敌新编第8旅，活捉旅长王光宗以下1600多人，缴枪1200多支、炮14门。接着，红4军乘胜进占广济，威逼蕲春、武穴、黄梅，与江南湘鄂赣红军遥相呼应。

至9月1日，红4军在短短1个月内，以5个多团的兵力，取得了连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4城，歼灭敌军7个多团的重大胜利，有效牵制了敌原拟派至江西的部分兵力，有力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攻克英山——红四军南下首战告捷

■ 胡建远



绽放在华中敌后的“拂晓之花”

■ 杨润鑫 宋可昕

抗日战争时期，在华中敌后根据地活跃着这样一支特殊队伍，他们积极奔赴在敌后战线之上，穿梭于人民群众之中，以舞台为战场，用文艺激发根据地军民抗战热情，用戏剧揭露日寇残暴罪行，积极担负起“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瓦解敌人”的任务。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这支队伍正是于抗战烽火中诞生、在隆隆炮火中成长的拂晓剧团。

拂晓剧团是彭雪枫将军的“三件宝”之一，其成立时间可追溯到1938年。当年4月底，竹沟教导大队第一期学员将要结业，而劳动节也快要到来。为在劳动节纪念大会上能给当地群众和教导大队增加节日气氛，彭雪枫邀请由延安来此工作的木刻家刘观和教导大队俱乐部主任路丁，从教导大队第一期学员中挑选几名擅长文艺的学员，组

织一个剧团，演出几个节目。刘观和路丁受命后，从教导队中选拔了黄明善、王石青等15人，经过几天昼夜排练，终于在劳动节纪念大会上演出了《烽火》《九一八以来》等多个节目，受到官兵和当地群众好评。几天后，经彭雪枫批准，并由他命名，“拂晓剧团”在“五四”那天诞生了。之后，为了工作需要，剧团骨干开始分散工作。9月底，新四军游击支队正式组建，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率领游击支队东征前，彭雪枫从第二期教导队中抽调一批队员和余下的剧团成员组成青年先锋队，负责部队行军中的宣传工作。12月中旬，青年先锋队开始在杞县招收了一批青年学生。这些学生个个朝气蓬勃，能说会唱。彭雪枫决定以他们为骨干，重建拂晓剧团，进行文艺演出活动。自此，拂晓剧团的光芒开始照耀在豫皖苏边区的各

个角落。

成立伊始，由于演出设备简单简陋，演出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加之当时文艺工作的紧迫性，拂晓剧团面临着种种困难。然而，在上级领导的关心下，剧团成员齐心协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把演剧当成革命工作，把演出当成战斗，在人员、技术、剧种上不断磨炼，终于在豫东鹿邑县演出的第一个活报剧《打鬼子》中，取得非同凡响的效果，当场吸引大批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参加。此后，拂晓剧团的人员、设备得到了一定的补充，阵容逐渐壮大，随之而来的也是更重的革命任务。逢年过节，或是遇到重大纪念日和活动，都要排练节目进行演出，用文艺的力量支持革命事业。

拂晓剧团的演出节目以“抗战”为中心，不仅题材广泛，内容深刻，而且形式多样。既有《农村曲》《放下你的鞭子》《游击队的母亲》等歌剧、戏剧和话剧表演，也有《傻小子打游击》《小放牛》等现代京剧，还将《日出》《雷雨》《原野》等大型剧目搬上了舞台。并且根据当时抗战局势对《打渔杀家》《空城计》《法门寺》等传统京剧进行改编。剧团演员们还深入人民群众中，将民间流行的秧歌、快板、相声、双簧、打花棍等艺术形式搬上了舞台。

这些艺术题材和形式既避免了文艺作品庸俗化，又传承了民族文艺的特色，将革命故事、英雄事迹、军民鱼水情等主题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剧团就用这一幕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作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残暴手段、批判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的丑恶嘴脸，宣扬新四军官兵们舍生忘死的英雄事迹，激励着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革命队伍日益壮大。

同时，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拂晓剧团同样也是用来批判问题，警示官兵，对官兵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工具。1941年底，剧团演出了王震之同志创作的三幕话剧《流寇队长》，用剧中生动的例子教育党员干部们务必重视思想工作，克服单纯军事观点；1943年，在整风运动的大潮下，拂晓剧团又为部队排演了苏联名剧《前线》，借此批判了剧中系列人物不严格落实责任制、空话连篇、官僚官调等不良作风，为推进队伍内整风运动的深入落实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拂晓剧团不仅是一个宣传队，更是一个战斗队，抗战时期中剧团演员们往往扮演着多种角色。在日常巡演的过程中，剧团就通过演出节目开展革命斗争。一旦突发敌情遭遇战斗，剧团演员也迅速加入其中，不仅要搞宣传鼓动，还要负责护理伤员、运送弹药或教育俘虏等工作。特别是面对日寇的大“扫荡”，为更灵活地与敌人周旋，剧团化整为零，分散到各个连队任职，进行火线文艺宣传工作。他们不仅要在沿途写标语、画漫画、组织支前，还要作为文化教员教战士们唱革命歌曲、表演文艺节目，给他们上文化课，用笔杆子、嘴巴子，给语言进行战斗。

通过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线上不断打磨锤炼，拂晓剧团涌现出一大批优秀革命文艺人才，积累了大量革命剧目，成为豫皖苏边区的“革命播种机”。在当时腥风血雨的时代绽放出了一朵充满“朝气、希望、革命、勇进”的文艺之花，激励着部队和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

抗日战争胜利后，拂晓剧团改编为华中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又活跃在七战嘴脸，宣扬新四军官兵们舍生忘死的英雄事迹，激励着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革命队伍日益壮大。

“小星星”行动

■ 牛 颖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波茨丹第一保育院（现位于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州）的孤儿和老师来不及撤离，被迫留在德占区。1943年至1944年，德军伤病员数量不断增加，德军医院血库告急。于是，德军决定利用波茨丹第一保育院的孩子为伤员输血，甚至提供移植器官。保育院院长米哈伊尔·斯塔潘诺维奇·福林科获悉这一阴谋后，压制住心中的怒火，经过冷静思考后向德军建议，将孩子们转移到采暖、饮食和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别尔奇齐村，孩子们营养好了才能更好地提供血液和器官。德军对此表示同意。

福林科除院长身份外，还是当地游击队所属的“无畏”游击小组组长。福林科与游击队取得联系后，共同制订了一个周密而大胆的“小星星”行动计划，即把孩子们转移到游击队控制区后再用飞机护送到苏联后方，同时也将先前战斗中受伤的游击队员转移出去。

1944年2月18日，夜幕笼罩大地后，一个由150多名孩子、30多名保育院员工和游击队员等人组成的队伍，悄悄向游击队等待接应的森林深处行进。队伍里最小的孩子只有3岁，但也知道眼下情况有多危险，在行进过程中尽可能不发出声响。

不久，德军发现孩子们逃跑了，十分震怒。他们一面封锁消息，甚至撒谎称孩子们已被送到德国去了，另一面集结大批部队向游击队进攻。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正加紧分批夜航护送保育院的孩子和工作人员，以及受伤的游击队员。为了能运送更多人，飞机上没有领航员，无疑增加了救援难度和危险系数。

4月10日，是执行“小星星”行动的最后一天。当天夜里，飞行员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马姆金负责护送最后一批撤离人员。马姆金时年27岁，却已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没想到这一晚，他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就在马姆金驾驶的飞机即将抵达目的地时，突然遭到德军一架歼击机疯狂扫射，弹片击穿油箱，飞机起火。大火迅速蔓延到驾驶舱，马姆金的飞行服后背部分开始破裂，毛皮向外翻卷，但他的手一直紧握操纵杆。飞机最终降落在苏联后方一片结冰的湖面上，其他人员幸免于难，马姆金因严重烧伤于4月17日去世。人们将这位英雄安葬在马克洛村。此次行动中，他空投了20多吨货物，拯救了近300名伤员和几十名保育院师生。

上图：游击队员向马姆金递送孩子。



拂晓剧团排练节目(资料照片)。